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想象的城市

The imagined cities 都市在文本中是怎样被呈现的
Urban Experience and Language of the Novel

[美]罗伯特·阿尔特著

阿尔特著
邵文实译

想象的城市

The imagined cities

都市体验与小说语言

Urban Experience and Language of the Novel

[美] 罗伯特·阿尔特 著

邵文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的城市 / 张鸿雁、顾华明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11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ISBN 978 - 7 - 5499 - 3638 - 0

I . ①想… II . ①张… III . ①城市学—研究 IV .
①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133 号

IMAGINED CITIES: Urban Experience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
by Robert Alter

Copyright © 2005 by Robert Al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想象的城市——都市体验与小说语言

著 者 [美]罗伯特·阿尔特

译 者 邵文实

责任编辑 任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99 号

开 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30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99 - 3638 - 0

定 价 28.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taoba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 - 85406265, 845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 - 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主 编 张鸿雁 顾华明
副主编 王爱松

序

张鸿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城市化的发展既有共同规律，也有不同国家各自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独有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侧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① 经典作家认为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历程证明，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是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例外。^② 同样，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历史经验也证明，要想使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够健康发展并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何桂全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1.1。

^② 张鸿雁、谢静，《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创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特别要择优汲取西方城市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以避免走弯路。^① 我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社会问题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借此机会把我以往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观点和认识重新提出来供读者参考。

一、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优化选择

2013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 52%，正在接近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关键是，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将仍然处于继续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而且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的社会变迁期。这一典型的社会变迁——中国新型城镇化关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质量以及社会的公平问题。

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适度紧缩的城市发展理论、有机秩序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拼贴城市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花园城市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以及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等，这些成就对人类城市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贡献，在推进人类城市化的进化方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中国城市化需要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城市化理论进行扬弃性的运用，从而最终能够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面对有些问题我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在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西方国家，在当代仍然存在着普遍的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②，而且在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也都

^①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 3。

^② 参见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创新战略》。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集中在城市，形成典型的“城市社会问题”。如城市贫困、城市就业、城市住房、城市老人社会、城市社会犯罪、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城市住区与就业空间的分离、城市中心区衰落以及城市蔓延化等问题，甚至有些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社会问题，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社会中不断发生。这些现象的发生，与我们缺乏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的全面理解与择优运用有关。

在建构中国本土化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对外来城市化理论进行有比较地、批判性地筛选，这不失为一种谨慎的方式。西方城市化发展过程所表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双重地域结构效应”。^① 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与美国近 80% 左右的人居住在中小城镇里的高度分散，就是这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既有强调城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化”价值的一派，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派。回顾以往，在某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如果 21 世纪初的城市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这不仅是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更是对中国城市发展道路的严重误导。而事实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城市化”的创造，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论模式为“模本”，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城市化——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②。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导

^① 张鸿雁，《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②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南美洲巴西等国家，人均 GDP 超过 3 000 美元，城市化率达到 82%，但贫困人口却占国家人口总数的 34%。一方面是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却是贫困人口增加……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参见：王建平，“避免‘拉美陷阱’”，《资料通讯》，2004(4). 46。

致“都市病”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仅适于美国等人少地多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推行到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破坏性建设。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还有些成果要么是戏剧化的，要么是过于理想化的——从乌托邦的视角提出城市化的理论，被喻为“要构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①，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样，有其合理内核，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必须认真选择，优化运用。

二、中西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认知

与西方城市化“动力因”相似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但是，除此而外，中国城市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非但不同于西方，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通过“政府制度型安排”形成高速的城市化。所谓“制度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与城市战略的规划是政府管控的；二是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投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三是城市化的人口发展模式是政府规划的；四是城市的土地是由政府掌握的，等等。这一动力模式具有强大的权力力量的优势，同时也具有典型的行政命令的弱点。中国城市化以三十多年的时间跃然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城市化路程，成就令世界瞩目，

^① 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白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4~25。

但城市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深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事，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科学的城市理论来引导。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承袭了古典时代思想，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长入”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使得在城市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转型，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差距”与“文化差距”。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现。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以来，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城市化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的。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式”，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力”，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中世纪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解释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生存，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在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进行中国式的“第三次土地革命”^①，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世界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浪潮之中。

^① 张鸿雁，“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第六次城市革命”，《城市问题》，2008.1。

三、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过程^①，这种变迁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进步型的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是这一变迁的继续，我们不难看到，在城市化的进化型变迁中，在解决传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没有不存在问题的社会，亦如发展本身就是问题，现代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的命题一样，社会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因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历史的空前绝后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繁杂：有些是传统社会问题，即没有城镇化也存在；有些是城镇化引发和激化了的问题，要梳理出关键点加以解决。

“当我们渐近 20 世纪的尾声之时，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国家对公共官僚和文官制度表示满意。”^② 这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英格拉姆在研究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时的一段论述。正因为如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制度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式和声势不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把改革与创新作为同一层次的认知方式，而不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运动的方式。亨廷顿曾有针对性地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提出这样的分析：“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着“政党与城乡差别”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现实正是“城乡差异”二元结构深刻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当代的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都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关。他认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

^① 张鸿雁等，《1949 中国城市：五千年的历史切面》。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②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9。

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国城乡差别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建构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城市市民社会。

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①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属于城市的，这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人们对城市向往的原因所在。对于城市的“伟大”认知不止于斯宾格勒，早在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他对城市的评价是这样的：“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②我惊叹于四百多年前的学者能够对城市有如此独到而精辟的论述，虽然这种论述包含着对王权价值的认同，但论者能够从独立的视野中发现城市的价值实是难能可贵。而且，四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也充分证实了这种美誉式的判断。同样，也是在四百多年前，乔万尼·波特若还提出了创造城市伟大文化的方式与入径：“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③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再创造，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的出版目的十分明确：我国的城市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工具，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9。

^②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③ 同上。

有助于形成并完善我们自己城市理论的系统建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新型的城镇化过程中，避免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出现的失误。新型城镇化是在建立一种新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是改变传统农民生活的一种历史性的改变。“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①

该丛书引进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大致涵盖了相关领域的重要主题，它以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具有前沿性、实证性和并置性等特点，带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与启发。

学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城市化实践经验，研究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化管理体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功能。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丛书一定会有很多问题，也借此请教大方之家。读者如果能够从中获取一二，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院长
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会长
(2013年11月于慎独斋)

^①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19。

深情地献给史蒂夫和汉娜·阿施海姆

前言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小说与城市间的密切关系很可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难理解，这种关系一直是长篇大论、有时又单调乏味的批评性讨论的主题。如果小说的读者和关注者一直以来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且如果小说这一于印刷机发明之后出现的唯一重要文体是出类拔萃的现代文学文体，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小说应当一而再、再而三地聚焦于城市这一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剧场及集体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在整个现代阶段经历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具动态的成长。

然而，大多数对于这一大论题的讨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集中于城市的物质现实是如何在小说中挂上号的。无论是在天真地、至少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文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老派批评家中，还是在新派批评家中（无论他们是马克思还是福柯的近代追随者，抑或是两者的追随者），这种集中性都同样明显。也就是说，新老阵营的批评家们都津津乐道于小说是如何“表现”或“反映”城市现实的。他们追问，从阅读有关伦敦的贫民窟、巴黎的下水道、19世纪大都会新兴的购物商场的时代小说中，从阅读有关股票市场、妓院、上流社会和剧场之类的机构的时代小说中，从阅读有关阶级关系、社会流动性、权力机制和城市生活的新经济压力的时代小说中，一个人能够了解到些什么？

当然，此类问题往往并非与许多小说家，特别是19世纪的小说家所想到的种种目的毫无关联，因为有些作家会把自己的行为想象为一种有关当代世界的特权独享的报告文学形式。但对物质现实和社会机

制关注的表现往往模糊，小说写作与新闻写作之间还存在着质的差异，而且在从小说想象走向客观的集体现实之时，可能还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毕竟，写一本小说，就是从一个高度渲染过的视点来重塑这个世界——这一点不可避免，小说家们常常如此，包括小说中的人物。个人想象的这一艰辛过程既清晰地体现在诸如声称自己是当代社会小心翼翼的实验者的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这样的小说家身上，也体现在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这类抒情小说家身上。

在从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直至 20 世纪初的这段时期（这正是本书以下章节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小说的一种决定性发展是这样一种实践：叙事越来越多地通过小说主人公或主人公们每时每刻的体验——感官的、感觉的、精神的——来进行。即使是在小说家同样时时刻刻地关注社会和物质的直观表现之时，这种我应当称之为实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的普遍程序也可以成为叙事的中心。实验现实主义的微妙展开与都市现实新秩序的出现间的交叉点，正是此处呈现的从福楼拜到卡夫卡和乔伊斯等一系列小说家所考虑的对象。从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欧洲大城市呈指数级地发展壮大。（美国城市也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却较少成为小说家们的关注对象，因为其发展出现在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文化语境中，所以在此处的单一框架中尽量不同时讨论两者似乎是种审慎之举。）有大量证据（其中很多是文学之外的证据）表明，城市的这种迅猛增长引发了都市体验本质中的某种根本性变化。从建筑到公共交通再到经济，无论新的客观现实是什么，个人对生活在这种新都市地带的感受都迥然不同——步行在城市街道之上，融入市区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暴露于呈几何级增长的喧闹与杂乱之下，居住在城市新兴人口聚集区的公寓大楼或出租房屋里。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基本分类、自我的界定、个人自主权的感知开始发生变化。那些小说家在记录时千方百计地使之日趋精细和更具说服力的东西，那些使他们区别于新闻记者的东西，就是个人体验到的那捉摸不定的脉动，即心智与感觉是如何在世界中发生的，是

如何构建世界的，或者，是如何在偶然间被世界弄得惊慌失措的。

小说的实验现实主义追寻的是对于欧洲城市的业已感知的新现实的反应，它引导我从福楼拜开始，而不是巴尔扎克，否则后者也许是个更加突出的起始点。它还将我正试图讲述的故事不偏不倚地一路带向卡夫卡，乍一看，卡夫卡似乎从未染指过任何真实且具历史性的城市小说的描写，但事实证明，他是小说作为当代都市体验地震仪功能的具有启发意义的例证。就文学史而言，这一调查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期的一个人们可以探测到、至少是可以追溯到的现代主义的先导时刻。调查研究止于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 4 本小说，这个阶段是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极盛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顶盛期。这一终止点绝非意在暗示从那时起人们对于城市小说论述的兴趣已荡然无存，而是表明 20 世纪 20 年代确实标志着始于福楼拜的散体小说（可能也表现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之中）的某一发展弧线的完结。随着历史的飞速前行，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城市在过去的 80 年中一直在持续壮大，只不过速率较前稍缓而已，而且它们似乎完全超越了从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头 30 年都市中心区的极速发展所触发的过渡期间的巨大困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的小说选择都明白地指向提示性而非综合性。这些讨论无意于对小说和当代城市的历史展开宏大叙事（到目前为止，人们依旧有权利对极端的宏大叙事持怀疑态度），而是意在充当一种选择性采样，以此来突显小说发展中那一始终斑驳难辨的画面的中轴线。我希望这一调查研究不只具有考证之趣，因为我认为，折射在这些书籍中的发展脉络也许依然有要紧话要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城市中的人说，在城市中，与都市生活相伴随的问题的出现要远快于解决方法的出现。

有关福楼拜的两个章节最初作为雷马克欧洲文化系列讲座（Remarque Lectures in European Culture）2002 年秋呈献于纽约大学。我要感谢雷马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所长 Tony Judt 邀请我作这些演讲，并就讲座主题安排了一门学院的研讨课程，它们向我提供了

珍贵的智慧启迪。这两个有关福楼拜的讲座，加上随后的 6 个讲座，后来变成了我于 2003 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温菲尔德欧洲比较文学系列讲座（Weidenfeld Lectures in Europe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我想特别感谢温菲尔德委员会的 Tony Nuttall 邀请我作这些讲座，感谢圣安妮学院（St. Anne's College）院长 Dame Ruth Deech 的热情好客。我的好友 Michael Bernstein 和 Tom Rosenmeyer 阅读了我的手稿，我要对他们敏锐的评论深表感谢。

本书在文秘方面的开销以及研究花费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席位 1937 级基金会提供。我要感谢 Janet Livingstone 为我忠实准确地打印手稿。